

世界三大湾区经济演进模式及驱动因素研究

——兼论对中国湾区经济发展的启示

郝宪印 颜培霞 钱进

摘要:湾区经济不仅是全球经济创新发展的核心引擎,也是支撑国际交流交往的重要力量。湾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对于中国塑造新动能新优势、全面深化改革创新、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均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与意义。通过聚焦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这三大世界级湾区,构建“区位-经济-空间-治理”四维分析框架,从历史演进视角细致考察了湾区经济的演变规律与主要特征;基于制度、经济、空间和社会逻辑,提出驱动湾区经济演进的“战略引领力、创新驱动动力、产业迭代力、协同承载力、开放包容力”五大动力模型。以此为鉴,不仅为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全面建成国际一流湾区提供有益启示,也为中国接下来培育新的湾区经济发展单元提供重要观察视角与依据。

关键词:湾区经济;演进模式;驱动因素;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

DOI: 10.19836/j.cnki.37-1100/c.2026.01.016

一、引言

湾区经济是全球经济创新发展的核心引擎以及支撑国际交流交往的重要力量。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全球约60%的经济体量集中于港口海湾地带及其直接腹地^①。中国高度重视湾区经济发展,国家“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十四五”规划又将其正式上升为区域重大战略,“十五五”规划建议进一步指出,要巩固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②。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背景下,湾区经济与生俱来的内引外联优势与市场经济属性,对于以全面深化改革塑造新动能新优势、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与意义。

近年来,中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全面推进,在支撑国家参与全球全方位竞争、引领区域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载体作用越来越突出。据统计,2024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达14.79万亿元,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约5.6万平方公里)和6%的人口(常住人口超8700万),贡献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③。但同时,粤港澳大湾区仍面临内部互联互通水平不够、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深度不足、发展的协同性和包容性有待提升、城市空间格局仍须优化等突出问题,对其加快跻身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构成严重制约。另外,随着对湾区经济的重视与关注,国内有关建设杭州湾大湾

基金项目: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软科学)重大项目“科技创新引领下黄河下游济青都市圈与郑州都市圈联动发展研究”(2025RZA0902);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农业社会化服务推动生产绿色转型的作用机制与路径优化研究”(23BJY169)。

作者简介:郝宪印,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山东黄河创新发展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济南 250002; helin123123@sina.cn);颜培霞(通讯作者),山东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济南 250002; yanpeixia@163.com);钱进,山东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济南 250002; qianjin2012abc@126.com)。

① 毛艳华:《世界三大湾区经济发展历程、经验及启示》,《人民论坛》2025年第6期。

②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24页。

③ 李永杰:《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广东实践新局面》,《中国社会科学报》2025年11月25日,第A01版。

区、环渤海大湾区、北部湾大湾区等相关议题的讨论也日益增多。鉴于此,选择世界三大湾区——美国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日本东京湾区,系统总结湾区经济发展规律与实践路径,为中国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比照和参考,成为当前必须关注的重大课题。本文在梳理既有研究文献基础上,采取历史分析方法、归纳总结法和比较方法,对世界三大湾区的发展特征及未来走向进行系统分析,探索其背后的动力逻辑和关键因素,为促进中国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启示与借鉴。

二、文献梳理与分析框架

湾区经济是由拥有较多发达港口群、产业群和城市群的区域所衍生的一种经济形态,是港口经济、滨海经济、都市圈经济和湾区地理形态聚合裂变而成的一种特有经济格局^①。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湾区开放层级相对较高,是较大区域范围内经济发展的引领者^②。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经济高地”,世界级湾区形成了完善的产业配套体系、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力、强大的集聚外溢功能、发达的国际交往网络和宜居宜业的城市环境等^③,具有全面开放、高度发展、市场融合、产业引领等典型特征^④。虽然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东京湾区的地理区位不同,发展条件和基础也各异,但成长为世界级一流湾区,其发展模式、成长路径及影响因素等呈现出鲜明的共性特征。伍凤兰等发现,湾区经济结构变迁与港口发展具有高度契合性,在基础性动力(如基础设施资源)、内生性动力(如分工、创新等)和外源性动力(如外力调控与引导)共同作用下,经济形态从临港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向创新经济演进^⑤。张昱等进一步研究发现,湾区经济不仅在经济维度上表现出产业结构有序演进,在空间维度上产业集聚模式与地理分布格局也在发生重大变迁,跨区域协调机制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⑥。另有一些学者从强有力的经济核心区、完善的产业集群、发达的交通网络、创新型人才集聚及科技创新能力等不同方面,考察了湾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⑦。

聚焦中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内学者从不同视角出发,围绕战略定位、科技创新、空间结构、湾区治理等内容展开重点研究。具体来看,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成为高水平开放的引领者、新经济发展的策源地和合作机制创新示范区^⑧需重点关注:一是通过建立产业耦合协同机制,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优势差异行业融合^⑨,着重解决湾区内产业结构趋同及同质化竞争问题;二是针对湾区内企业研发投入水平偏低、高素质人才不足、创新主体间合作不畅等问题,提出利用大湾区科研机构和企业等创新主体数量上的优势,从提高研发支持力度、城市协同发展、创新主体合作和人才引进等方面加强科技创新支撑力度^⑩;三是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活动外部性明显,面对世界经济不确定因素增多等外部挑战,塑造更高质量的区域对外开放功能空间以增强经济韧性^⑪;四是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协调发展水平仍有很大提升空间,以“新基建”为支点加强交通联结,保障区域要素流动和优势产业集聚重构空间发展格局^⑫;

① 卢文斌:《湾区经济:探索与实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5页。

② 申勇、马忠新:《构筑湾区经济引领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基于粤港澳大湾区开放度的实证分析》,《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③ 林贡钦、徐广林:《国外著名湾区发展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④ 张昱、眭文娟、谌俊坤:《世界典型湾区的经济表征与发展模式研究》,《国际经贸探索》2018年第10期。

⑤ 伍凤兰、陶一桃、申勇:《湾区经济演进的动力机制研究——国际案例与启示》,《科技进步与对策》2015年第23期。

⑥ 张昱、眭文娟、谌俊坤:《世界典型湾区的经济表征与发展模式研究》,《国际经贸探索》2018年第10期。

⑦ 张彦:《全球价值链调整与“湾区制造”高质量发展的策略调适》,《湖北社会科学》2024年第2期。

⑧ 毛艳华、荣健欣:《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定位与协同发展》,《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⑨ 陈燕、林仲豪:《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产业协同的灰色关联分析与协调机制创新》,《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⑩ 杨静、赵俊杰:《四大湾区科技创新发展情况比较及其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启示》,《科技管理研究》2021年第10期。

⑪ 刘逸、纪捷韩、张一帆等:《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韧性的特征与空间差异研究》,《地理研究》2020年第9期。

⑫ 霍祎黎、宋玉祥:《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测度与影响因素分析》,《经济纵横》2023年第2期。

五是基于大湾区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从特色区域治理角度,通过“块块”合作的分类对接以及“条条”贯通的跨层协调机制,共促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①。

梳理既有研究不难发现,区位优势、经济发展、空间结构、湾区治理是湾区经济得以形成和发展演进的基础性要素,也是表征湾区经济发展一般性规律的关键共性变量。与世界三大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虽然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种货币、三个关税区、三种法律体系”的特色区域,但制度差异的影响更多表现为湾区治理创新方向与治理模式的不同,与湾区高质量发展对高效能治理的内在要求并不冲突。从历史维度看,四大要素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间演进呈现显著的动态特征,同时彼此之间也存在因果互动关系。基于此,本文重点从“区位-经济-空间-治理”四个维度,系统搭建湾区经济发展演进的分析框架,从历史动态演进的整体性视角,更为全面地总结湾区经济形成、发展的过程性规律。这不仅有助于把握与提炼湾区经济演进背后的动力逻辑与驱动因素,也能够直面制约国内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矛盾和瓶颈,对推动中国湾区经济的迭代升级、自我强化和循环累积,具有针对性的政策指向价值。研究内容框架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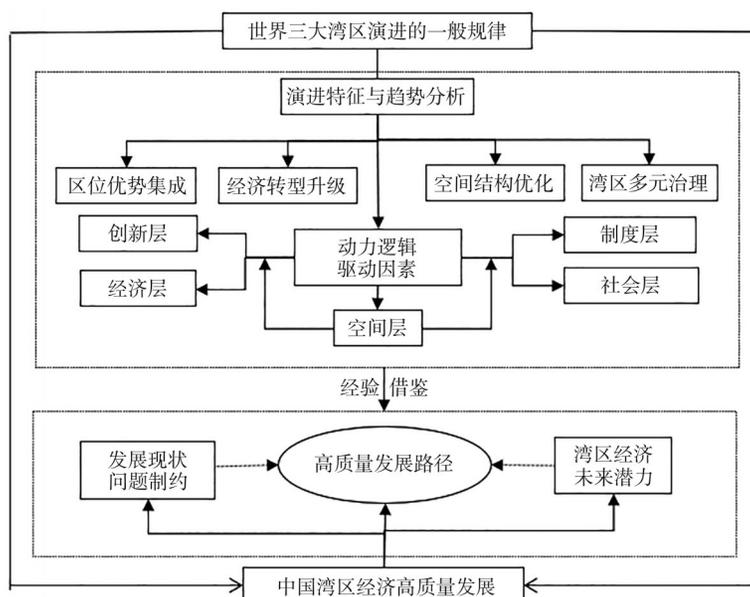


图1 主要研究思路与内容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湾区经济演进的典型特征与发展趋势

世界三大湾区引领全球经济风向历时百年,虽然发展各具特色,但总体演进特征、发展趋势具有很强的共同性与一致性。

(一)优势跃迁:地理区位优势叠加至集成式区位优势

区位条件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要素,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汇聚资金、技术、信息等要素资源以及便利化参与区域或国际分工具有直接影响^②。发展初期,拥湾抱海的优越地理条件是三大湾区得天独厚的基础优势。纽约湾区地处美国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的哈德逊河入海口,隔大西洋与欧洲相望,

^① 方木欢:《分类对接与跨层协调:粤港澳大湾区区域治理的新模式》,《中国行政管理》2021年第3期。

^② 覃成林、樊双涛:《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维度分析》,《齐鲁学刊》2024年第2期。

这为荷兰、英国等欧洲国家早期在此殖民以及开展货物贸易提供了区位便利;而河海交汇、背靠五大湖区、气候和地质环境适宜的港口建设条件,为纽约及其周边地区人口、经济汇聚进而推动港口经济崛起奠定了基础。随后,连通五大湖与哈德逊河的伊利运河正式开通,推动纽约港成为美国内陆地区农产品和矿产资源的集散枢纽,并迅速发展为美国最大的港口,对纽约湾区发展为全球化的世界级大湾区产生了深远影响。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同样如此,面向主要国际市场的地理区位和优良港口建设条件,为湾区经济崛起储备了巨大潜力。近代以来,美国和日本经济逐步走向服务化,凭借以港口为核心的区位优势,大湾区又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空间载体作用。根据《美国交通杂志》公布的2023年全球主要港口数据,纽约湾区的纽约新泽西港集装箱吞吐量达到781万标箱,位居全球第24位;东京湾区的东京港、横滨港吞吐量分别达到424万标箱和292万标箱,位列全球第43位和第65位^①。

以优良港湾为初始条件,世界三大湾区持续推动公路、水路、航空、轨道交通等多元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逐步形成了高度发达的综合性交通运输网络体系,进一步强化了交通区位优势(如表1所示)。在此基础上,世界三大湾区深度整合利用市场、资金、信息、技术等资源,在发展中不断强化其战略地位、经济区位和创新高地,最终形成了交通、政治、经济、创新等多种优势叠加的综合集成式区位优势,构成湾区经济演进中的鲜明特征。

表1 2023年世界三大湾区的公路、铁路、机场、港口等指标

湾区名称	高速公路密度 (公里/百平方公里)	铁路密度 (公里/万平方公里)	机场密度 (个/万平方公里)	港口密度 (个/万平方公里)
旧金山湾区	/	200.0	0.17	1.1
纽约湾区	8.2	248.2	0.28	0.9
东京湾区	8.7	530.5	0.44	1.6

资料来源:根据第四次纽约大都市区区域规划(The Fourth Regional Plan)、首都圈广域地方計画、旧金山湾区规划(San Francisco Bay Area Plan)等相关资料整理。

(二)经济转型:要素、产业、职能等雁阵式升级

伴随全球性的工业革命和信息技术革命,经济结构的雁阵式转型升级是湾区经济形态演进的主要脉络(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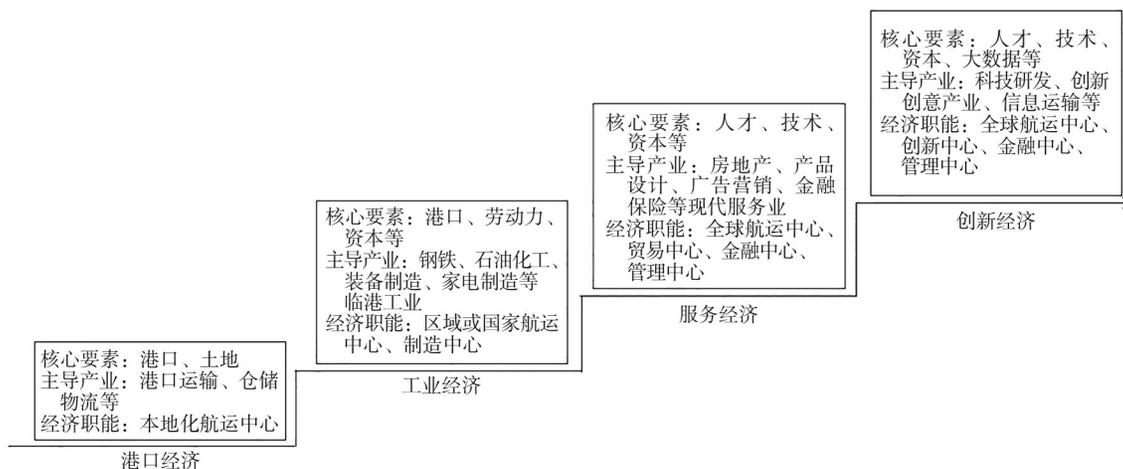


图2 世界三大湾区经济发展模式演进路径与主要特征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① “AJOT’s Top 100 Container Ports A-to-Z”, https://www.ajot.com/ajot_digital/766/?page=4, 访问日期:2025年5月15日。

第一阶段是运输成本导向的港口经济时期。依托港口功能,流通转运、物流仓储、专业化市场等相关产业迅速发展。例如,1825年伊利运河开通,极大降低了从美国东海岸到中西部地区的时间和运费成本,推动纽约港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口岸,1840年纽约的贸易量占到美国的18%,1860年纽约的贸易量占到美国进口贸易额的2/3和出口贸易的1/3^①。

第二阶段是依托传统资源要素的工业多元化发展时期。凭借便利、低成本的海运优势,港口成为煤炭、铁矿石、石油等大宗原材料的进口集散地,大量区位指向型、原材料依赖型、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企业在港口及其周围加速布局,三大湾区由运输服务、农产品加工等单一产业类型,发展为面向国内外更广阔市场、更长链条、更多样化的加工制造中心。纽约湾区形成了以服装、皮革、印刷、机械制造和食品加工等为主要支柱的制造业产业体系;东京湾区逐步成为食品、机械、造船、化工、汽车、光学设备等制造业的集聚区;旧金山湾区的钢铁、冶金等重工业,占据产业体系的核心地位。

第三阶段是制造业服务化转型阶段。伴随经济全球化以及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生态环境破坏等引发的国家发展战略调整,美、日等国将产业链中的生产环节向发展中国家大规模转移,使为全球化制造业服务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跃升为三大湾区经济发展的重心。纽约湾区致力于发展金融、保险、法律、会计等服务业,逐渐成为全球金融中心和跨国公司总部的集聚中心,在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中发挥管理与控制功能;旧金山湾区以硅谷的兴起为代表,成为世界科技创新的高地;东京湾区围绕大科学装置建设、文化传媒、产品设计等重点方向进行湾区功能整合与布局,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发挥重要的组织作用。

第四阶段是创新导向的经济发展新阶段。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围绕关键核心技术的大国博弈日益激烈,美、日作为占据创新高地的发达国家,逐步加大在科技创新、创业孵化等领域的布局力度,三大湾区的经济重心朝着引领全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创新型经济转变。以纽约湾区为例,2015年,纽约市在《一个新的纽约市:2014—2025》报告中确立了“全球创新之都”的发展方向,加速了从金融中心向科技创新中心的转型进程^②。据统计,2010年至2022年,纽约的科技行业产值增幅高达142%,是金融业和保险业增长速度的近17倍^③。

(三)空间重构:从单体城市到一体化城市群

从空间结构演进看,三大湾区均从早期相对孤立的港口小聚落、单体城市,逐渐发展成为具有较强人口和产业集聚能力的区域性或国家级中心城市,再进一步通过功能外溢以及与其他城市的协同发展,构建起大中小城市功能分工明确、相互紧密关联的一体化城市群。对此,具有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的区域发展规划给予了具体引领。

美国区域规划协会先后发布4次纽约大都市区区域规划^④,很好地诠释了纽约湾区以港而兴、港城联动的空间演进特征。20世纪初,纽约市的人口与产业集聚,给城市交通、环境等带来巨大压力。为此,纽约及其周边地区区域规划委员会于1929年第一次发布《纽约及其周边地区区域规划》,提出“再中心化”,即以单中心集聚为基本方向、通过合理的土地利用与交通方式进行空间功能整合与优化调整。二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伴随城市机动化趋势,城市中心衰退和郊区蔓延问题同时显现。1968年发布的第二次区域规划,提出以加大公共交通布局的方式,推动就业岗位、公共服务和开放空间合理供给,积极培育内城和郊区次中心,引导形成大集聚、小分散的都市圈空间结构。第三次区域

① 郭保强:《从费城到纽约——美国金融中心的变迁及其原因》,《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

② 卓泽林、张肖伟:《从金融中心转向科创中心:高等教育集群赋能城市转型发展——基于纽约市的探讨和分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年第2期。

③ 《纽约及伦敦科技行业快速增长给深圳的启示》,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96733185586755831&wfr=spider&for=pc>, 访问日期:2025年4月19日。

④ 周恺、孙超群:《百年交响:四次纽约大都市区规划的历史演化分析》,《城市发展研究》2021年第10期;孟美侠、张学良、潘洲:《跨越行政边界的都市区规划实践——纽约大都市区四次总体规划及其对中国的启示》,《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规划(1996年)以“危机中的区域”为主题,侧重应对全球化背景下区域竞争力衰退与可持续发展问题,采取积极增长模式推动区域多中心建设,发挥各级中心在经济、公平与环境“3E”目标中的积极作用。2017年,针对国际金融危机后促进收入增长、区域韧性发展与建设健康城市等新议题,第四次纽约大都市区规划以一体化、网络化发展为导向,对区域轨道交通网络建设、多部门和各地区共同参与区域治理等进行了展望。历次的旧金山湾区规划^①以及日本首都圈基本计划^②,其空间结构也基本遵循从单体城市、首位中心城市到一体化城市群的演变轨迹。

(四)治理优化:由单一性到系统化

作为涉及多区域、多主体、多目标的空间单元,三大湾区由弱到强的过程,也是湾区治理由单一到多元、由简单到复杂、由面向特定问题到系统性建构的探索过程。

发展初期的湾区治理,为打破行政壁垒和地方保护,一般通过组建跨地区委员会(或理事会、董事会)的形式,对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要素一体化融合、产业互补错位布局等重要事项进行顶层设计和决策协调。早期旧金山湾区9个县各自为政问题较为突出,导致了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不高、生态环境质量下降等问题。在此背景下,加州政府推动成立了湾区交通运输委员会,对湾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行使统一规划与协调职能;同时,由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共同参与组建湾区政府协会,推动湾区区域规划和政府间合作。纽约港早期运营中曾存在州际水域冲突,纽约州和新泽西州联合成立了纽约-新泽西州港务局,成为政府间跨域合作的经典案例^③。随着湾区经济发展,交通拥堵、生态环境恶化、生活品质下降等压力越来越大,三大湾区先后形成了由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居民等多元主体构成,涵盖创新经济发展、社会公共政策和服务、生态环境整治、居民生活品质提升等多维目标的区域协同治理路径。在政府层面,对影响湾区高质量发展的问题进行跟踪并推进政府间的全方位合作,着力塑造更加包容开放的贸易投资体系、更加有利于创新创业的政策和体制、更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更高生活品质的居住和人文环境等。在企业层面,利用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敏感性和政策推动的柔性,由企业赞助和发起成立跨域治理的社会组织,如旧金山湾区委员会,在表达地区诉求、促进地区间经济对话中发挥了积极作用^④。在社会组织层面,前文提及的美国区域规划协会是一个成立超过百年的非营利组织,其董事会由政府机构负责人、专家、相关行业知名企业家等组成,在乔治·华盛顿大桥位置选址、布鲁克林地区振兴等湾区重大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湾区经济演进的动力逻辑与驱动因素

湾区经济是市场规律占主导的自然演进过程,本质上是创新经济、开放型经济、城市群经济等多种经济类型的集合。从经济空间层面看,创新、分工、空间集聚等经济机制,在推动湾区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动力源与核心支撑作用,具体表现为创新驱动、产业迭代力和空间协同力。从制度社会层面看,湾区经济的发展必然“镶嵌”于一定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中,从而与制度、社会等发生紧密关联;政府和社会各类主体积极参与的人为干预过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湾区经济演进的进程和高度。分解来看,宏观制度层面加入“人的能动性和理性”的战略引领力,为湾区经济演进定目标、把方向,而社会层面“服务于人和要素”的开放性和包容力,则担负着不可或缺的基础保障功能^⑤。

① 郭杰、姜璐、张虹鸥等:《流空间视域下城市群功能协同发展研究——以旧金山湾区为例》,《热带地理》2022年第2期。

② 冯文猛、聂海松:《日本首都圈发展历程及规划变迁》,《东北亚学刊》2017年第5期。

③ 杨爱平、张吉星:《纽约-新泽西港务局运作模式对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治理的启示》,《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④ “Bay Area Council”, <https://www.bayareacouncil.org>, 访问日期:2025年5月25日。

⑤ 张三保、李佳芮、张志学:《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估、比较与优化》,《珞珈管理评论》2025年第6辑。

据此,综合考虑湾区经济发展的内外交互作用特征,提出“战略引领力、创新驱动动力、产业迭代力、空间协同力、社会包容力”五大动力要素相互关联、共同支撑的湾区经济动态演进逻辑。

(一)制度层:战略引领力

新制度经济学者诺斯的“制度决定论”强调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随着湾区经济的发展,无序竞争、环境污染、空间拥挤、发展规划不合理等区域性公共问题日益增多并相互交织,对湾区的一体化、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威胁。通过湾区治理的制度创新,对其进行前瞻性设计和全方位谋划,对区域公共问题给出积极响应,是三大湾区保持竞争优势的基础前提。

美、日等国家根据自身实际,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治理模式以及超前的战略引领优势。日本的“广域行政”跨域治理模式,主要通过附属的地方公共团体(包括都道府县以及市町村)间的垂直型和水平型合作,建立“事务的委托”“合作协约”“部分事务组合”“广域联合”等运作机制,对东京湾区内跨行政区划的公共事务进行共同处理^①。日本政府颁布的《首都圈整備法》和不同时期的首都圈基本计划,旨在用广域治理理念和法律法规手段保障以东京都为中心的区域一体化发展。而美国则形成了多方参与和多层治理的“新区域主义”治理模式,强调治理过程的优化,主张通过建立健全有效的竞争和协作机制,提升跨域公共事务的治理能力和竞争力^②。如旧金山“湾区规划2050+”除经济、环境和交通三大领域外,在加大包容性社区和多层次住房建设、控制租金涨幅水平、允许老旧购物中心和办公区等改造为住宅、推进未开发利用土地再利用等政策方面达成共识,凸显了超前的战略谋划能力以及通过协作机制保障不同利益的制度安排。总之,完备、超前的区域发展战略引领力,不仅有助于为区域决策机构提供可行预案,及时应对区域发展可能出现的危机和风险,也有利于快速回应社会关切、强化凝聚力与一致行动力,从而有效支撑湾区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创新层:核心驱动力

创新是湾区经济发展动力的核心来源。大学知识溢出可带来高水平的创新产出^③,面向全球市场需求和科技创新最前沿,分别形成了纽约湾区“多中心+轴线”式、旧金山湾区多中心互补式以及东京湾区“中心+边陲”式的大学集群^④。高水平大学集群与各类研发机构、风险投资企业、创新创业群体等相融合,构成了高效运转的协同创新生态系统,推动大湾区成为全球性的科技研发中心和创新高地。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中,面对电子计算机、微电子技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产业发展机遇,旧金山湾区不断强化知识溢出效应、提升创新能力,还推动钢铁、冶金等传统重化工业向以苹果、谷歌等科技企业为代表的创新经济转型;纽约湾区通过实施“东部硅谷”计划,将“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定位纳入新的目标愿景,2019年已跃升至全球创新城市排行榜首位,有力改善了金融业一家独大的产业格局;东京湾区不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和支持力度,已成为大型科学装置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为湾区经济抢占产业制高点提供了坚实支撑。

(三)产业层:升级迭代力

产业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只有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和激烈的区域竞争中始终具备较强的要素与产业集聚能力,才有机会成长为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组织控制力的世界级大湾区。三大湾区利用自身优势、与全球市场紧密互动,不仅在不同历史时期培育形成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主导产业,更逐步塑造出产业体系持续迭代升级的内生动力,促进经济体量与发展质量双提升。产业迭代能力来源于三大优势:一是天然的基础优势。传统经济地理学将区域经济增长归因于资源禀赋和良好区位,“拥

① 白智立:《日本广域行政的理论与实践:以东京“首都圈”发展为例》,《日本研究》2017年第1期。

② 张紧跟:《新区域主义:美国大都市区治理的新思路》,《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③ Jaffe A. B., “Real Effects of Academic Researc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9, 79(5), pp. 957-970.

④ 欧小军:《世界一流大湾区高水平大学集群发展研究——以纽约、旧金山、东京三大湾区为例》,《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湾抱海”的地理区位和良好的港口条件,成为湾区经济形成和发育的基础动力。二是产业分工合作优势。分工和专业化,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湾区经济总量和市场容量的持续扩张,催生了更加复杂、细分的专业化分工,这不仅直接提高了区域生产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同时增强了更多市场主体参与和进入该生产体系的可能性,为新兴产业的持续孵化与壮大营造了良好成长环境,形成了超强的产业集聚能力和迭代升级能力。三是不断强化的集聚优势。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强调了收益递增在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发展和集聚中的核心作用,全球经济时代,其他地区无可比拟的内引外联特性和能力,决定了湾区不仅是高端人才、资本、现代技术等优质生产要素汇聚的中心,也在持续巩固作为世界信息汇聚中心和全球生产网络控制中心的主导地位,这种不断自我强化的收益递增效应对产业集聚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三种关键力量相互叠加、彼此强化,为湾区经济持续演进注入不竭动力。

(四)空间层:协同承载力

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彼此独立的单体城市重组为优势互补的城市体系,网络化、集群化竞合发展态势更加突出。全球化和信息化深入推进,加快孕育出全球性的城市等级体系,不仅支撑东京和纽约占据全球性金融节点,而且同步推动三大湾区逐步发展成为以一个或多个中心城市为核心、城市功能相互依存、经济联系紧密的巨型城市区域^①。无论是东京湾区以东京都为中心的圈层式空间发展模式,还是旧金山湾区以旧金山、奥克兰、圣何塞等数个区域中心共同引领模式以及纽约湾区以纽约市为首位中心城市的多中心网络空间模式,无不彰显了不同规模、不同功能城市间的分工协作与紧密互动。总之,构建以共同利益为纽带、城市职能分工明确、空间结构合理有序的湾区一体化发展机制,既有利于打破个体城市或区域空间发展限制、资源禀赋结构单一、本地市场狭小等内在束缚,也为共同应对外部挑战、化解湾区内部竞争矛盾、持续塑造更强的资源整合能力与竞争力提供了坚实的空间保障。

(五)社会层:开放包容力

高度的社会认同,是湾区扩大对外开放、凝聚湾区共识的内在支撑。社会认同是“一个社会的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的集中体现,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观念,它是团体增强内聚力的价值基础”,涵盖政治认同、群体认同、文化认同、地域认同等不同类型^②。作为一个多元化移民国家,美国努力构建多样性和多元性、崇尚平等与公正的包容性社会,使美国文化兼具“同化论”和“多元文化论”特征,外来移民既能很好地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同时又适应和认同美国文化。旧金山湾区以宽容失败的创新创业文化闻名,由此吸引了大量创新型企业 and 创新创业人才。据2022年美国联邦社区调查数据,旧金山湾区(旧金山大都市统计区口径)内,非英语语系人口占比41.9%,大学以上受教育人口占比53.6%,非美国出生人口占比31.7%;在纽约湾区(纽约大都市统计区口径)的比重也分别达到39.7%、43.9%、29.8%,而同期美国的三组数据仅为22%、35.7%和13.9%^③。与具有移民传统的美国不同,日本东京湾区营建社会凝聚力,更多是通过推进湾区内交通、教育、医疗、文化设施等一体化建设,强化具有湾区概念的地域认同和文化认同。

五、对中国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启示与建议

对世界三大湾区演进规律及动力要素的深入探析,可为中国提供有益启示。尽管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代表的湾区经济建设起步较晚,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根本支撑,将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为世界湾区发展的重要范例和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引擎。

① 彼得·霍尔、考蒂·佩因、罗震东等:《从大都市到多中心都市》,《国际城市规划》2009年第S1期。

② 方文:《群体资格:社会认同事件的新路径》,《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③ “Census Reporter”, <http://censusreporter.org/>, 访问日期:2025年4月19日。

(一)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现状及其制约因素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强调,到2035年粤港澳大湾区要全面建成宜居宜业宜游的国际一流湾区。《规划纲要》实施以来,通过加快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制度规则相互衔接、创新驱动协同发展、完善生产要素高效流动配置机制等系列举措,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成为中国开放水平最高、经济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在经济体量上可与旧金山、纽约、东京三大湾区相媲美(如表2所示)。但对比世界三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具有发展模式的独特性和发展潜力的巨大性。

表2 2023年粤港澳大湾区与世界其他三大湾区的主要指标对比

主要指标	粤港澳大湾区	旧金山湾区	纽约湾区	东京湾区
土地面积(平方公里)	56098	17887	17312	36898
人口(万)	8662	752 ¹	1926 ¹	4435
本地生产总值(万亿美元)	1.89	0.76	2.1	2.0
本地生产总值实质增长(%)	7.7 ¹	10.9 ¹	5.8 ¹	-3.2 ²
人均生产总值(万美元)	2.25	13.21	10.2	4.62
机场客运量(万人次)	6962.5	1194.0 ¹	7544.0 ¹	6418.2
机场货运及航空邮件量(万公吨)	658.0	237.0 ¹	216.0	315.4
港口货柜吞吐量(万标箱)	8205.7	233.7	949.4	838.1
第三产业占GDP比重(%)	64.9	82.8	89.4	82.3

注:1表示2021年数;2表示2020年数。其中,旧金山湾区包括环绕旧金山湾的9郡地区,纽约大都会区包括纽约(New York)、纽华克(Newark)、泽西(Jersey)和周边的23郡,东京湾区包括东京都和周边7县。

资料来源:根据全球数据库(CEIC)《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报告(2024)》《世界湾区发展指数研究报告(2023)》,香港贸易发展局,https://research.hktdc.com/sc/article/MzYzMDE5NzQ5等相关资料整理。

从制度层面看,一方面,粤港澳大湾区“一国两制”下横跨不同的政治制度、法律体系和行政体系,开世界湾区经济发展模式之先河,在增强湾区治理制度创新独特性和开创性的同时,也增加了湾区治理的难度和复杂性;另一方面,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区域合作进程明显加快,资源配置、产业协同、交通规划、空间布局等公共问题越发显现,对湾区治理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从创新层面看,粤港澳大湾区高校、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高度集聚,城市间知识创新合作联系紧密,2024年湾区综合科技创新指数位居全球第六,虽不及第一和第二位的旧金山-圣何塞、纽约,但优于第九位的东京,对打造创新型湾区形成有效支撑。然而,未来仍须克服产学研相对脱节、高端创新人才不足、金融服务支撑创新力度不足等制约问题^①。从产业层面看,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规模庞大、结构完整的产业体系,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三次产业占GDP比重由2017年的1.2:32.7:66.1调整为2022年的1.32:30.87:67.81;三地产业高度互补,香港是金融商贸中心、澳门是休闲旅游中心、广州是商贸流通中心、深珠惠莞是高技术制造中心。但总体看,产业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还具有较大提升空间,特别是深珠惠莞,仍偏向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产业同质化竞争明显,服务经济和创新经济占GDP比重偏低等。从空间层面看,粤港澳的空间结构,从最初的“前店后厂”发展为以港澳为开放门户、穗深为核心的多中心发展新阶段,不同城市的专业化集聚优势逐步加深^②。多方式、网络化的交通体系日益完善,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等,但畅通大湾区“四面八方、四通八达”战略通道的建设任务

① 辜胜阻、曹冬梅、杨崑:《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生态系统的战略思考》,《中国软科学》2018年第4期。

② 孙久文、夏添、胡安俊:《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集聚的空间尺度研究》,《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依然较重。从社会层面看,粤港澳地域相近、文脉相亲,港澳青年对大湾区的信心与社会认同度显著提升,但仍须在增强湾区社会认同感与凝聚力方面持续施力。

(二)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立足中国基础和实践,从湾区经济演进的五维动力着手,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宜如下安排:

第一,推进治理制度创新,优化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引领力。一是针对行政壁垒和体制机制障碍,借鉴日本“广域行政”经验,发挥中央政府的主导型治理作用,设置超越地方行政权力架构的区域协调机构和制度协调机制。二是针对跨区域协调难题,借鉴美国新区域主义的协作机制,通过划定共同开发特别区域、组建政府间议事协调理事会、成立企业为主导的湾区委员会、强化非政府民间组织或智库话语权、联合设立基础设施投资运营公司等经验做法,搭建跨地区公共事务治理体系以及协作型、网络化的治理制度。三是针对政府间的合作机制,借鉴欧盟多个国家不同法律体系下的开放式协调机制^①,强调尊重广东省政府自主权、港澳特区政府高度自治权基础上的非强制性协作治理和利益共享。

第二,完善创新生态系统,强化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创新驱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创新中心与创新生态系统建设:一是打造创新人才汇聚高地,坚持人才培养与人才引进相结合,依托高校、科研院所、重大科技创新工程、重点实验室建设等,自主培养一批专业化人才;实施高端人才引进专项行动,促进人才的跨地区流动与优化配置。二是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优化金融服务,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市场双向开放创新,完善以香港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为核心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促进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的“四链”融合。三是重点推进“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广深科技创新走廊、深港创新圈等创新基地和创新平台建设,促进基础理论创新、应用技术创新、工艺工法创新、市场集成创新等贯通融合。

第三,持续深化分工与协作,增强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迭代力。发挥不同城市的功能优势,提升产业集聚力和竞争力。一是针对资源错配和同质化竞争问题,进一步明晰港澳穗深四大中心城市的职能定位,增强中心城市对周边中小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大湾区城市群错位发展与优势互补。二是通过优化地区间的合作联席会议、合作促进会等不同制度设计,打破粤港澳三地行政边界和制度差异,促进人才、资本、信息等现代要素的自由流动与集聚,加快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分工合理、相互协作、深度融合的优良产业生态,支撑创新链、价值链的整体跃升以及配套完善的世界级产业集群建设。三是把握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时代机遇,重点在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现代医药、人工智能、脑科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赛道发力,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新质生产力。

第四,提升统筹联动水平,夯实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承载力。粤港澳大湾区涉及不同土地所有制度和开发管理机制,通过政府协作与市场运作的方式,找到合作共赢的结合点,澳门与珠海横琴岛的合作模式为跨地区、跨制度进行要素整合利用提供了成功范例。在未来发展规划方面,一是探讨广东9市与港澳在区域战略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等领域的对接协调,引导城市和区域功能布局相互衔接、一体布局,提升区域空间建设品质;二是可以深化毗邻地区和内地重点园区等项目的合作开发机制,在用好港资、澳资的同时,为港澳产业和经济发展提供可行的空间要素保障;三是围绕海洋生态环境整治、绿色低碳发展等领域开展同防共治,共同提升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居民生活质量。

第五,增强社会认同感,提升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开放包容力。一是通过共建文化设施、共办文体活动、共享文化服务、整合旅游资源、促进高校交流等不同形式,促进文化合作与文化认同。二是持续强化地域认同。一方面,继续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铁公机水”联动高效的综合交通网络体系,为三地便捷的人员流动和文化交往提供“硬支撑”;另一方面,以高共性、易融合的跨境教育、就业、居住、养老等重点民生领域为切入点,优化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和标准,集中打造湾区优质生活圈,

^① 毛艳华:《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研究》,《南方经济》2018年第12期。

增强湾区居民的归属感和自豪感。三是强化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岭南文化为精神纽带,以开放包容、创新共享为价值核心的文化重构与社会建构,构造深层次的群体认同和价值认同。

(三)中国未来可能的湾区经济展望

对湾区经济发展历史规律及其背后动力逻辑的探析,不仅有助于强化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理论指导,也为我国培育新的湾区经济发展单元提供了较为科学的观察视角。着眼于湾区经济演进特征以及五大动力逻辑,未来可选择具有湾区经济发展潜力的环渤海大湾区、杭州湾大湾区重点推进。环渤海大湾区,不仅是中国最大的湾区,也是北方地区承载国家重大发展使命的重点开发区域,对于遏制“南北失衡”态势、构建“一带一路”重要支点以及实现东北亚经济合作发展意义重大,在国家战略安排上具有打造湾区经济的现实必要性;从发展基础看,环黄渤海地区涵盖一个较为成熟的京津冀国家级城市群、两个区域性城市群即山东半岛城市群和辽中南城市群,汇聚了我国北方最高端优质的资源要素、最强的创新能力和经济实力,同样具备打造世界级湾区的现实可行性。杭州湾大湾区,依托长江经济带和长江三角洲一体化发展两大区域重大战略,具备高位推进的战略叠加优势;产业基础坚实,联动沪杭甬的协同条件优越,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多元,尤其是汇聚了一批高水平的战略科技力量,基本形成了可与粤港澳大湾区相媲美的综合发展能力。随着中国加快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环渤海大湾区、杭州湾大湾区将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注入新动力和新活力。

The Economic Evolution Patterns and Driving Factors of the Three Bay Areas in the World —Insights fo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Bay Areas in China

Hao Xianyin Yan Peixia Qian Jin

(Shando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Jinan 250002, P.R.China)

Abstract: The bay area economy is not only the core engine of global economic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but also an important force supporting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bay area economy is of great strategic value and significance for China to create new momentum and new advantages, comprehensively deepen reform and innovation, and promote high-level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Focusing on the world's three largest bay areas including the New York Bay Area, San Francisco Bay Area and Tokyo Bay Area,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four-dimension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location-economy-space-governance”, exploring the basic laws and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ay area's economic evolu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Based on the institutional logic, economic logic, spatial logic and social logic, a five-power model of “strategic leadership, innovation-driven momentum, industrial iteration power, collaborative carrying capacity, openness and inclusiveness” is proposed to drive the economic evolution of the bay area. The findings not only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and references for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nto a first-class international bay area, but also offer important perspectives and foundations for China to cultivate new bay area economies in the future.

Keywords: Bay area economy; Evolution model; Driving factors;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纪小乐]